

原远东军事法庭助理检察官高文彬回忆“东京审判”——

800本庭审记录控诉日本兵罪行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昨天，作为虹口区提篮桥街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讲教育主题活动的一部分，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助理检察官高文彬向社区部分青少年学生讲述了当年审判日本甲级战犯时的情景。

曾目睹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被审判

今年已92岁高龄的高文彬是目前唯一健在、曾目睹审判日本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人的当事人。虽然年事已高，但老人说起当年审判日本甲级战犯时的情景，依然记忆清晰，思维敏捷。“1945年7月，我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后，便在上海地方法院担任刑事庭书记官。由于看不惯‘衙门作风’，3个月后就辞职了。”高文彬向学生们慢慢地打开了尘封已久的记忆……

辞职后的高文彬得知中国派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检察官向哲浚正在国内招募一批熟悉法律且英语基础好的工作人员前往东京增援的消息，在东吴大学知名教授刘知芳的推荐下，参加面试并获成功，于1946年3月到东京，成为国际军事法庭助理检察官。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设在日本东京涩谷区原日本陆军省旧址，这是二战期间日军对外侵略的军事指挥机构。车子开上去是一个小高地，内部呈环状。一楼就是法庭，检察司设在三楼。”高文彬向学生们讲述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由参与审讯的中国、美国、苏联、荷兰、加拿大等11个国家法官组成，检察官也是由这11个国家检察官组成，检察长为美国律师季南。

发现南京大屠杀日军杀人比赛新闻

高文彬回忆道，1946年在法庭上出现了一个重要证人——末代皇帝溥仪。“他个子高高的，戴着一副眼镜，并宣读了自己的证词。当念到妻子去世后，受到日方逼迫再娶日本人时，他的声音都在颤抖，情绪相当紧张。”由于法庭需要，溥仪出庭作证近一个星期，提供了不少有力的证词。

高文彬说，整个审判过程中，“南京大屠杀”事件被列为重点，审判持续了数个星期。有一次，高文彬在图书馆翻阅资料，无意中发见日本东京出版的《日日新闻》上刊登了一张摄于1937年侵华日军攻入南京后不久的照片。照片上，两名日本军官刚刚进行完一场杀人比赛，看谁砍中国人的头多。高文彬说到这里神色中依旧难掩悲愤。出于职业敏感，高文彬仔细观察了这张照片的背景，并记下了那两名日军的名字：向井敏明、野田岩。后来，在审理日本甲级战犯松井石根及其幕僚武藤幸章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两人对“南京大屠杀”负有主要责

任。南京中国军事法庭在收到高文彬从东京寄来的证据材料后，终已将混在一般日本投降兵回国的向井敏明、野田岩抓获，并绳之以法。

高文彬告诉学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历时近两年半，自己参与了整个过程，先担任“国际检察局中国检察官办公室翻译”，后又担任助理检察官和检察官向哲浚的秘书。期间，高文彬主要负责整理每天的庭审记录，查阅相关资料以供庭审时使用。在对日本甲级战犯在华犯罪进行审理时，高文彬为了收集更多证据，经常加班至深夜。“两年多的审理，仅庭审记录就多达800本。”高文彬回国时带回了两套庭审记录，一套送给了当时的中国政府外交部，另一套送给了母校东吴大学。

外孙女访日参加文化交流活动

高文彬从上海海事大学退休后在家颐养天年。老人对记者说，这些年自己得到了来自社会各方的关爱和帮助。社区干部也经常上门嘘寒问暖，有事只要一个电话，就会立即上门帮助解决。

尽管是独居，但高文彬的生活安逸而充实。精神矍铄的老人每天读书、看报、上网、听音乐，尤其喜了解政治军事类的话题。住在东长治路的老人，有时还散步到外滩观景，早几年更是带着相机拍摄了不少上海的旧景新貌，并记录下市井趣事。老人说，他的两个女儿都在国外，大女儿在美国缅因州定居，小女儿则在澳大利亚定居。在她们出国前，高文彬再三叮嘱：“到了国外，一不能做任何有损祖国形象的事；二不能参加任何非法活动；三要认认真真做学问，老老实实做人，还要锻炼身体。如违背了这三条，我就与你们断绝父女关系。”现在，老人经常与两个女儿互打越洋电话，通“伊妹儿”，这成了他生活中最大的乐事。

高文彬在谈及自己的外孙女郭苓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据老人说，从小品学兼优的郭苓曾被波特兰市著名艺术团体破例授予“民间大使”，出访日本大阪开展文化交流。在缅因州，郭苓可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个中国人。高文彬感慨万分：“半个多世纪前，我在日本审讯战犯。半个多世纪后，我的外孙女在日本传播友谊。真是令人唏嘘，又令人欣慰。”

今天被定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高文彬感到十分有意义。他说：“当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铁的事实，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作为当年亲自参加过审判日本甲级战犯的当事人，日军所犯下的血淋淋罪行还历历在目。希望青少年学生了解历史，勿忘国耻！”

特约通讯员 龙钢
本报记者 袁玮



■ 昨天，92岁高龄的高文彬为学生讲述当年东京审判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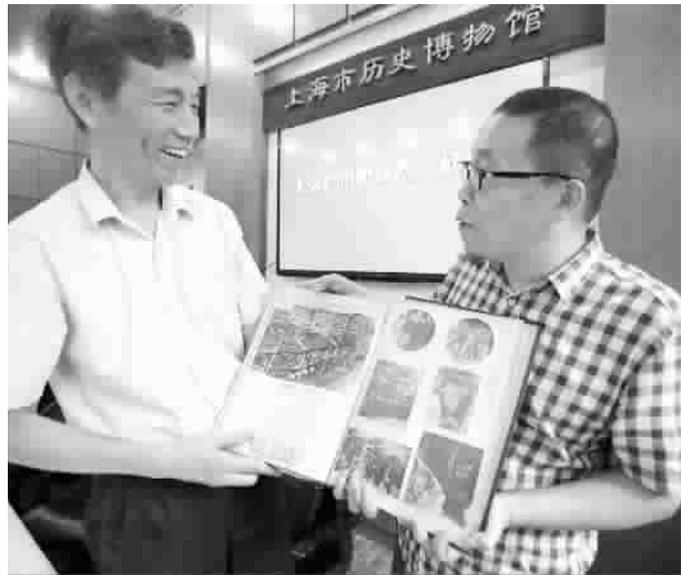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捐出“见证抗战胜利”文献实物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 实习生 胡嘉俊 李娜）“这些物品在我家里存着是发挥不了大作用的，但放到了博物馆就不一样了，可以让更多的人通过它们，了解日军侵华的这段历史，以及中国人民奋起抗战，最终取得伟大胜利的壮举！警示后辈，勿忘国耻！”今天上午，沪上著名收藏家王金声先生，将其多年收藏的“见证抗战胜利”的珍罕文献和实物——《中国抗战大画史》《抗战建国大画史》《昭和七年上海派遣军纪念写真帖》、日本读卖新闻社出版的《支那事变写真帖》以及抗战铜墨盒，捐赠给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在捐赠现场，王金声介绍了这些文献实物的“前世今生”。1947年出版的《中国抗战大画史》，是王金声家祖传下来的珍罕文献。“这是抗战时期的战地记者曹聚仁与当时复旦大学新闻摄影教授舒宗侨共同编著的，记录了中国人民八年抗战中的点点滴滴，集权威性和全面性于一身，也是第一部全面反映抗日战争的影画史料。”王金声透露说，这本大画史还曾经作为审判日本战犯的证物，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案桌上，影响深远。

王金声说，抗战铜墨盒、《抗战建国大画史》以及《昭和七年上海派遣军纪念写真帖》，都是他在古玩市场、拍卖会 and 国外古董交易市场上收购来的，花了他不少钱。《抗战建国大画史》收录了大量中国抗日战争的照片以及当时国军将领的手迹。因为此类史料流传下来的较为稀少，十分罕见，所以这本画史有着



■ 王金声（右）上午向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捐赠文献实物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很高的研究价值。

《昭和七年上海派遣军纪念写真帖》是王金声在日本的一次拍卖会上“淘”来的，这是日本编纂的一本记录淞沪会战的书籍，直接体现了日军侵华战争罪证，因其由日方出版，而更具说服力。抗战铜墨盒是在抗战时期的学生和文化人士随身携带的一种便携式砚台，其盖子上刻有“抗日救国”的字样，反映出当时人民对抗战的态度与决心。

王金声的收藏历史已超30年，凭着一腔热情，他的收藏收获颇丰，其中“见证抗战胜利”的文献和实物特别珍罕。这些年，也有不少拍卖行

找到王金声，希望他能将这批物品卖给他们，都被王金声婉拒。“我把它们捐赠给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价值更大！远比赚钱更为重要！”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研究部副主任王毅认为，这些文献和实物弥足珍贵，真实记录和反映了中国人民取得抗战伟大胜利的历史过程，是抗战胜利的“见证”物，也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帮助市民尤其是广大青少年牢记历史、勿忘国耻，更加深刻地了解日本帝国主义当年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教材”。对中华民族及子孙后代永远牢记这段屈辱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